

抗日战争期刊汇编



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抗日战争期刊汇编（八）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前

鋒

鋒雨



期四第 · 卷二第

版出日五十月四年一十三國民華中

本 期 目 錄

目錄

我們對印度問題的理解

華 博

力行哲學的體系綱要

袁月樓

「政治的道理」和「行的道理」

符 浩

社會事業與抗戰建國的關係

黃 塵

太平洋形勢的現階段與中國抗戰

陳 情

軸心的新攻勢

張 蘭

職業青年的職業教育問題

梁上燕

中學生的職業出路與職業補習

王儋娟

美國男女學生的汽車訓練

曾育羣譯

裝飾藝術史話(下)

鄭克基

廣西革命鈞沉記

蔡勁伯

邊村小景(文藝)

馬兜鈴

問題·竹

龍 朱

詩「秋歌賦」

孫 飛

前鋒月刊

第四期

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前鋒社編輯部

(桂林二三號信箱轉)

發行者 前鋒社

(桂林梧栖路一七號)

印刷者 漢口中國印書館

(桂林梧栖路二八號)

總經理 中國文化服務社廣西分社

(桂林梧栖路一七號)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定價表

訂購辦法	期數	價目	郵費
全年	十二期	七元	免
半年	六期	三元五角	免
零售	每冊	六角	二分

廣告刊例

地位	顏色	面積
底封	三色	一五〇元
底封	二色	一四〇元
底封	單色	一三〇元
正文前後	單色	一〇〇元
正文中	單色	八〇元
插白	單色	每方寸二元

續登附期九折，半年七折，全年對折



前鋒月話



我們對印度問題之理解

印度是大英帝國的一塊基石，它有四百六十七萬五千平方公里的面積，幾和蘇聯以西全部歐洲的面積相等，它有二萬五千萬多的人口，約等於全世界人口總數的五分之一，所有的人說它「不但稱得上是一個國家，簡直是一個『大帝國』」(Satemundus)。然而，在國際政治上，它又被作為英帝國的「殖民地」看待的。

依據一九三四年英帝國所給予印度的憲法，英領印度的政治區分，除有都德里(Delhi)是一個特別區外，計包括孟加拉(Bengal)、孟買(Bombay)、麻打拉斯(Madras)、阿薩姆(Assam)貝拿爾(Bihar)、奧里薩(Orissa)、中央省(Central Province)、聯合省(Uttar Pradesh)、旁遮普(Punjab)西北邊省(N.W. Province)等特(Sind)等十七省，此外，還有散佈於全印度，大小約六百個的土邦，和面積合計約六二、二〇〇方哩的部落酋長之領地。國內的民族與教派，又相當複雜，以往在印度民族運動中，大多數印人

常希望自己的國家能夠獨立，民族能够自由，但是那些王公酋長，有時却游移不定：最大多數的印度教徒和大多數的回教徒，在民族解放運動中，也常受英帝國的挑撥離間而發生了所謂「宗教的少數民族問題」(Religious Minority)這是過去的事實。

印度問題，不單是英國的，而也是全世界的，尤其在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正義與暴力正在作最後搏鬥的今天，印度問題的合理解決，更為全世界同盟國家打倒暴政重建世界和平的關鍵，我們應該澈澈的理解印度問題，並進而謀合理的解決印度問題。

怎樣理解印度問題呢？有人以為：

(一) 印度內部自身不能統一，所以在政治上不易獲得解放。

(二) 殖民地與宗主國利害對立的結果，迫使印度人民不願與英國合作，從而對德意日抗戰，不見得能發生多大效果。

其實，這都是一種偏見，因為：印度內部宗教與階級之間，固然有不少不能協調的地方，但這種傳統習慣上歧異的因素，並不是不能改變的我們知道現在印度的國民大會，是甘地和尼赫魯等所主持，即從前的印度國民黨，而現任國民大會主席阿沙德，就是有名的回教徒，人們也曾以甘地和尼赫魯間因信仰宗教性的差異，而嗟嘆着他們所採取的政治路線與策略的不同，會分散了為印度而奮鬥的力量，但尼赫魯則表示「甘地與甘地一同失敗，不願沒有甘地而獲得暫時的成功。」甘地也說：「至於尼赫魯，我們彼此都深曉得誰都不能離開誰，因為在我們之間，只有一個聯合的心，而不是任何智力的差異所能分開的」，其對於拯救民族事業的「親愛精誠」，直可為天下法，上次蔣委員長訪印，所有各地王公以及各黨派領袖，都山各方面很遠的地方約集起來，更是一個最明顯的例證，故所謂印度內部不統一也者，多半是不自然的，即是人為的，這種不自然的人為的不協調，是可以在爭取民族解放的同一目標下，團結起來，統一起來。

至於說到印人不與英國合作，對德意日抗戰，便表示出熱心，從而對整個反侵略戰爭

不會發生什麼驚人的效果。這也是本報的時說，簡直是侮辱了印度，印人對英國現行統治政策不滿，致使他們有了力量，在現實政治情況未改之前，無從發揮出來。但他們不是反對抗戰，也非反對英國人，而是反對英國對於印度現有的政策。印人很清楚印度這塊肥肉，不儘日在的政權。德國更是垂涎萬丈，他們更知道本要來吞嚥，德國更是要直接放出來的難，他們絕不寬容許第二個統治者來統治印度，其抵抗德意日侵略者的心理與意志，是一致的，而且是堅決的。所以祇要英國政府當局能早日今後除舊佈新，努力適用業已變遷的環境，勉為新時代新政策之創造者（參照士報社評）深知舊殖民地去繁榮國家的時代已過去，順應印度國民普遍的心理，積極改進她的統治政策，印人不但不會再取這種消極的不熱心態度，而且會堅決地以全力參加反侵略戰爭，來抵抗德意日的侵略。

總而言之，印度問題，雖是相當嚴重而複雜的問題，多少年頭，聚訟不決，但不是不可理解，我們固然不應把它看得太簡單，但問題了問題的某一面，即以爲沒有方法可以解決，甚至認爲縱使有比較合理的解決辦法，也不會引起印人對目前英國對德意日抗戰的興趣，這和機械的辦法，一樣是有害的。

人類歷史演進到現在的階段，應該是殖民地的制度終結，新世界的到來，是依據歷史的則以銳的意志強行的。以英印關係言，正像教士報所說：「世界的新局面，絕無藉

式英國立足之餘地，英國在遠東所執行之殖民政策，現已遭遇強硬之變革，吾人應付之道，惟有努力反省，並作徹底之改革」。從事實觀察，對印度問題應有合理的解決，已爲全世界有正義感的人們所注意，在英國，最初有華森爵士擬具了解決印度問題的四項具體計劃，提交英首相邱吉爾，繼將英京重要大臣克利浦斯也在議會提出了關於印度問題的報告，我們的將委員長印度之行，更引起了對前途各國政府當局和人民以及全世界弱小民族深切的注意，「英人亦一致希望改善英印關係，均承認政府必須採取行動，對印度要求自由，實行若干讓步。」（三月三日中央社倫敦專電）到了「英戰時內閣所派商討關係未來世界秩序重要問題的使署」克利浦斯到印後，這世界範圍的英印政治交涉之進行，更爲具體化了。

可是，不幸得很，「英國缺少總壓力，祇知注意昔日之傳統，對於已獲利益，堅執不放，使他不能對於遠東政策，實行具有革命性之全面改革。」（見泰晤士報印度問題討論）所以在克利浦斯使赴印前後全世界人士曾寄與莫大的希望，到了三月二十九日克氏在印正式宣佈英國解決印度問題建議後，情形便不相同。甘地則英印協定，爲和平性質，各方亦表示未能完全接受，雖經克氏詳細解釋建議原意，而印度各黨派始終一致要求修改，因民大黨已正式提出具體對案，即英國政府人士對英印提出的建議，不之爲「慷慨之建議」，而「只能防印度認清未來利益」而加以「接受」，外電且傳羅斯福總統擬出任斡旋，表示予實權，採取切實的方法，或者和美國對英律

由英國對印大保證英國於戰後履行諾言，以免談判破裂，克利浦斯氏也向英戰時內閣提出「緊急呼救聲號」，交涉前途，雖未至完全絕望，而此問題的嚴重性，確是事實。

英國此次所提出的解決印度問題的原建議，共有五項，而印度人民拒絕接受者，即達四點之多，美國雖允許印度於戰後獲得自治地位，亦祇「於戰後」而已，由於過去歷史的教訓，使印人不能不深懷於這「一期一報」到期時或有被拒絕承允的可能，而一個國家的國防大權有賴於外人之手，對國家體制民族尊嚴上，似亦有損，這點，固爲吾人所深表同情的。

但是問題發展到現在，需要作一最後的清算，我們不能以僅對某方表示同情即可了事，也不宜對任何一方有所偏袒與苛責，而應該站在盟友的立場，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誠的態度出之，因爲印度問題如能合理解決，不特英印之利益，對整個反侵略戰爭合作問題，也有莫大的利益，所以我們希望英國政府徹底了解這一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其所造成的局勢，決非上上次大戰僅限於歐洲戰場者可比，太平洋戰爭，最初即在英荷兩國殖民地土地進行，現馬來亞荷印相繼淪陷，緬甸戰事，正進行中，孟加拉灣外的安達曼（Andaman）和緬甸的阿恰布（Achoh）敵兵均已登陸，戰事已迫近英荷遠東最後的根據地，意者英明的英當局，必將接受太平洋戰事初起時失敗的教訓，對殖民地民衆，尤其對於廣大的有組織的印度民族，一定要賦與更有精神與活力的印度民族，一定要求賦

實一樣，明白宣言，有日期的尤其充分的自由，以激發印人對於民族本身的忠誠，則印度不僅目前可以倣今日的非律賓，效忠美國，共同抵抗倭寇到底，而且將來可以倣今日的美國，對英國一樣的與之同生死共存亡，如此，我們無論對日對德對俄作戰，印度均可以作我們同盟國勝利的根本力量之一，一定可以在地中海印度洋太平洋上發揮反侵略最大的功效，共同反抗侵略，以實現世界真正的和平。

印度聯邦對英國所提建議，初非根本原則上有所堅持，而因克利浦斯聲明英政府之建議。非全部接受，即須全部拒絕，計劃中之若干主要點之全部或一部為印人所不能接受，惟有採取拒絕計劃之途的苦心，我們深予相諒，英國建議內容，雖不免「稍有含糊者」，但英特使克利浦斯已表示要努力排除困難，且說「各項困難之點，現已消除至頗為有限之程度」，英戰時內閣於得到克氏「緊急呼救呼號」後，

已授權克氏以處理印度問題的全權，同意設立印度國防綱領部，而印度軍總司令德維爾與克氏晤見後，即著即與印度國民大會主席阿沙德及尼赫魯等商談，「以便瞭解印度防務問題的廣泛性」，則對於原建議中由英國代負印度國防之責的爭執，或可獲得較合理的解決，我們雖不贊同紐約時報「因印度無一具有相當經驗的指揮官」之說法，作為英國應代籌印度國防重責的理論根據，但處在今日艱鉅的戰局中，我們應特別重視「時」的因素，而此次戰爭，實為同人類禍福總關鍵，決非某一國與另一國各別之利害關係，為求反侵略民主陣綫之勝利，集中統率與指揮，實為事實所需要，故所謂國防領導權也者，如能以維持英方之作戰指揮權為原則，爭取整個反侵略陣綫進行反侵略戰爭一事實上之利益，而不含有鎖壓殖民地的意味，則對印度的尊嚴，倘無損害，印度友人，似亦不必斤斤爭辯。

「以此大戰等，實為全人類自由與奴隸之戰，光明與黑暗之戰，……亦即世界被侵略者與侵略勢力之戰。倘此次戰爭，反侵略陣綫失敗，則世界文明必須倒退百年而不止，全人類之慘劇，將不知伊於胡底矣。」我們所以深切注意英印關係問題，其原因就在這裏。『深信我聯邦之英國，將不待人民有任何之要求，而能賦予印度人民以政治之實權，俾能更發揮精神與物質無限之偉力』。同時又切望我兄弟之邦的印度人士，能「懷悟民族主義在太平洋戰爭開始以後，而有甚大之轉變，各民族求得自由之方式，今昔實亦有所不同，」應「在此新時代中，盡其應盡之責任」，（蔣委員長告印度人民書）相忍相讓，相輔相成，各以最快速度最英勇的決心與行動，來求得印度問題的合理解決，「攜手同登此爭取自由世界之戰場，以求獲得最後之勝利，完成吾人在此一時代中無可推諉之使命」。（蘇薄）

關題

龍朱

故人夢寐說橫槍，舊雨飄零冷股肱，慚愧

十年吳季札，倘無一劍掛秋墳。

竹

冲年玉樹凋秋葉，壯歲金鞭委下塵，百諒
多聞非戰友，笑他松老與梅岑。

題「秋聲賦」

孫飛

匝地烽塵萬事除，漫憑落葉問年華，詩人

憔悴佳人老，愁對西風聽暮笳。

其二

十萬男兒夜枕戈，罡風吹動洞庭波，還將
家國無窮恨，付與孤鴻一曲歌。

力行哲學的體系綱要

袁月樓

(一) 引言

力行哲學是革命實踐中的產物，它是針對着一定的實際任務，爲着國家和民族而建立的理論。我們講力行哲學，決不是坐在研究室裏高談闊論，而是要把它作爲行動的指導。因爲實際行動是一切事業成功的基礎，我國一般人的通病，即在口筆之爭太多，而缺乏了力行不懈，貫徹始終的精神，往往言不隨行，行不願言，文告之繁，累寸盈尺，而很少能見諸實行的。如爲孝弟之旨，其實儼然孝弟，而所行適與孝弟相反；講廉恥之言，其實儼然廉恥，而所行適與廉恥相遠，色厲內荏，口是心非，遂至相向以欺，相率以詐，弄得人心敗壞，社會腐化。我們爲了挽救這種頹風，所以不在多言而貴力行。不過實際的行動必須有正確的理論爲其動力和指導，才能保障成功。因此，力行哲學的理論，實有待於本黨同志之發揚。惟其內容非常豐富，本篇特就其體系大綱，作一個簡單的敘述。

力行哲學是黨從革命實踐中對宇宙人生及認識的現象所獲得的理解。它是上法天國運行，宇宙流轉不息的原則，遠究孔孟大學中庸之道，近師陽明及國父學說，所得出的結論。它指出了行的目的，說明了行的動力和行的方法。它的理論體系，舉其最顯著者而論，約可歸納爲下列幾點：

- 一、認識論
- 二、宇宙論
- 三、人生論
- 四、進化論
- 五、目的論
- 六、動力論
- 七、方法論

茲將以上所舉七項，分列論述如次。

(二) 認識論

認識論在論究我們如何認識外物。其重要之點有三：一爲認識的起源問題，一爲認識的本質問題，一爲認識的範圍問題。關於認識的起源，力行哲學認爲非理性亦非物質，而爲行動。國父認爲：「能知必能行」，總裁又補充一句：「不行不能知」。他以爲凡是學問經驗中已經獲得的知識，如果不是經過實行而證明有效，則不能斷定所知者果爲真知。所以我們一切事業，必須實行而後始有真知，也惟有能行而後能知，我們現在的知，是從過去行的經驗積累整理而成的；沒有過去的知，就沒有現在的知。今日求知，也唯有從力行中才能體驗知的價值。同時，唯有力行，才能充實知的內容。我們往往從力行之中，突生很好的思想，得到很好的見解，得到解決當前問題很好的辦法。假使不去力行，而專冥坐靜想，思路便不易開拓，真知也不易求得。譬如我們同志一致爲實行三民主義而努力，那麼對於本黨的主義及建設的理論，便一定有精闢充實的開發；從革命行動中定出的方案，一定能夠切實易行。假使一般同志不能坐言起行，徒尚空談，對於一切理論，也就會感到空虛不實了。出於上面的說明，足以證明行爲知之因，知爲行之果，能知必能行，無行不能知。故惟實行的不斷演進，始爲認識的源泉；追認識既立以後，始一轉局爲實行的南針。

是行爲根源，知爲派生，本來始，不容顛倒。其次講認識的本質，是以論究認識對象爲何物爲其主要論點。這與宇宙論中的本體問題，有着密切的關係。力行哲學的宇宙論，認爲宇宙萬物皆由精神與物質的配合而成。所以它對於認識的本質問題，亦否定觀念論，而認爲吾人周圍之萬物，是客觀地存在於吾人意識以外的。國父曾說明一切學問都是先行事實才有言論，又指出真知

說都是從科學而來，科學認為我們所處理的對象是存在於我們的意識之外的。所以我們認為「存在」離開人類的「思維」而自在，人類可以用思維去認識它，却不是因為有「思維」纔有「存在」。換言之就是外界事物能入於精神界，而化為觀念，但事物是獨立於人類意識以外的。這是力行哲學對於認識本質問題的看法。

認識的起源與本質，已略論如上。然則認識的範圍何在？對此問題，力行哲學雖是毫不懷疑認識的能力，不過以為認識能力，是逐漸發展并非一次完成的。由「不知而行」到「行而後知」，便是說明了這一點。並且認為吾人的認識能力，現在尚在繼續發展之中，這發展的動力便是「行」。宇宙人生無時不在行進之中，因為「行」是經常的，恆久的，所以認識能力也就永遠向前發展。只要我們根據已經知道的理，再一步步推出他所不知道的道理，經過長久的時間，便自然能夠包含對於事物的知識，而得到一種系統的知識和最普遍的真理。只要我們肯將即物窮理的工夫，繼續不斷的下去，則今日所尚不知道的部分，將來是一定可以知道的。簡言之，我們的認識，是以宇宙為範圍，而宇宙為一無窮之寶庫，故認識亦為一無窮之過程。總之，力行哲學認為「行」是認識的起源，而行須見於事物，故認識的本質是離開思維而存在的；又因為「行」是無息的，所以「知」亦是無限的。

(三) 宇宙論

宇宙論是研究宇宙的根本原理，與世界發生及其歷史和歸宿的問題。古人解釋宇宙的意義說：「上下四方謂之宇，往來古今謂之宙」；宇就是由一個無限小到無限大的空間，宙就是一個無限長的過去，經過憂鬱的現在，到無限長的將來的時間。所以綜合起來，宇宙就是指無窮的大空間和無限長的時間而言。在這無窮無限的渺茫的宇宙之中，各種自然的現象，變化不息，神妙難測。因此，唯心派的哲學家則謂「心」是宇宙萬有的本體和根源，精神先物質而存在；唯物派的謂「物」是宇宙萬有的本體和根源，物質先精神而存在。這種心物之爭，構成了數千年來哲學史上光輝燦爛的篇幅。其中雖也有心物

調和的論調，但實際上力為縮小，體系上理論詭妄，不是以解決心物之爭。國父孫中山先生認為：「精神雖為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為用也。考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為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合為一，……不可分離。」換言之，精神與物質乃「一體之二面，同物之異象，相因而生，相攝而成」（總裁語）。在本質上不可分先後。至於所謂「一體」或「同物」，即是指國父所特稱的「生」。故曰：「生是宇宙的中心」。陳立夫先生說：「吾等十輩輩」生」，所以生是統一物質與精神的，宇宙之間，沒有絕對的物質或絕對的精神之存在，它是不可分的，體物也有精神，其結晶也有生後。從前康德深知心物之爭為不合理，很想溶合心物於一爐，但他只做到了調和，沒有統一心與物，所以他只是一個折衷派的二元論者。國父創知難行易學說，以「生」的一元論來說明本體，才不重蹈二元論的覆轍。

宇宙萬有的本質是「生」。「生生不已」，「自強不息」，於是宇宙有了進化，這種生生不已自強不息的現象，就是「行」。「行是與生俱來的」，宇宙因為要「生」，所以才「行」，宇宙不行，也就不能生。行斯生，生方行。整個的宇宙，就是一個滔滔滾滾奔進不停的偉大的生命長流，永遠不斷的運行，無有停止。故曰：「整個的宇宙人生，皆屬行的範圍」。「真正的行，是天地間自然之理」。「古今來宇宙之間，只有一個行字，才能創造一切」。換言之，力行哲學的宇宙論認為宇宙的起源與運動無不在「行」中，即宇宙的本質亦為生的巨流，其表現也是「行」，「不行」則宇宙便要消滅。所以「行」是一切事物的起源，又是一切事物賴以依存的根據。

(四) 人生論

人生論是從整體上根本上闡明人生的意義與價值，而人生原是宇宙萬物之一，所以人生有無價值，就要取決於他在宇宙中有無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力行哲學的人生論是根據它的宇宙論的。而宇宙皆屬行的範圍。所以人生自少至老，在宇宙中間，也沒有一天可以脫離行的範圍。因為人是在行的中間成長，由行的中間而充實了人格，提高

了人格。所以人生。人生的有無價值，就要取決於他的力行精神。我們所以力行，是作宇宙的主宰，宇宙間無窮大的空間，是人生的舞台，無限長的時間，是人生的旅程，宇宙萬物都是為人而生的，待人而用。我們發揮人類的聰明才智，以征服自然，宰制宇宙，造福人類社會，才能表現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所以人之生也，是爲行而生，那裏我們的行，也爲生而行。所謂生就是爲人類生活，繁榮生命，民族生存，國民生活而行。所謂行也應當爲人類生活，繁榮生命，民族生存，國民生活而行。換言之，人生的目的是在於社會全體的發展。人生的價值，也就在能爲宇宙間起點的生命創造，能要求人類全體生活的增進。否則，這一滴小的人生，便無意義可言了。至於生活怎樣才能增進，生命怎樣才能創造呢？換言之，人類的前途向上發展，是幸福的，是樂觀的，但是，要如何促進人類幸福的发展呢？我們認爲宇宙萬物的發展，必須要有中和的調和律，古人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就是這個道理，中和的實現，必要指定原則天下爲公的思想，以服務爲目的，不以奪取爲目的，以互助爲原則，不以門戶爲原則，服務與互助兩者綜合起來，便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的意思。因爲在人生的複雜活動中，有吸引與排斥兩種主要現象，這些則吸引，這些則排斥，遂生爲順，這些不順；人生之終極目的是求達生，所以吸引是常態，排斥只是達到吸引的「或然的」狀態。吸引才是創造與增進的原動力，排斥只是在增進與創造的發達過程間遇了阻礙（逆生）的一種病態，不能視以爲常。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服務與互助的精神，是造成吸引作用的，奪取與門戶則適相反，它是逆生，是排斥。所以服務與互助才能「致中和」，才是人類高尚的道德標準。也是人類進化的原動力。

總之，力行哲學認爲行就是人生，要求實人生的意義，就與力行。我們所以力行的精神，互助合作，爲人類社會服務，聰明才力愈大的人，愈發揮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的人，盡其能力，以服千百人之務，造千百人之福。我們只要將發力行，人所能之。一個人如果覺得「行」就應該「行」，也就一定「行」。須知天地萬物無時不在運動之中，而人類也無時無刻不在勞動門

等的行動之中。

(五) 進化論

天體有不斷的運行，宇宙才有不斷的進展，人類有不斷的力行，社會才有不斷的進化。宇宙和社會進化的動力，就是一種行的作用，故行是一切文明的源泉。宇宙自物質進化時期到物種進化時期，再到人類進化時期，但宇宙爲什麼會這樣的進化呢？就是行爲動力。行是天地間自然之理，所以宇宙的進化是必然的。國父認爲太極動而生電子，電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質，物質聚而成地球，再由生元而成人，其間由微而顯，由簡而繁，向上發展，是有其因果關係的。這裏所謂動、凝、合、聚，以及由生元而至於成人的因果關係，無非是一個行字在那裏發生作用。所以物質進化時期過渡到物種進化時期，更過渡到人類進化時期，這一個字進化的全部過程，完全是一個行的過程。凡是生長成發展以及其階段與某階段的銜接，都是一段與前一段間的準備與補充，無不是行。試看整個的宇宙，小的如電子，大的如星球，皆無不是時刻在運行之中。有此時刻刻的運行不息，宇宙才由電子而元素而物質而地球的進化。這種宇宙進化的階段是屬必然的。我們就所知的地球看來，礦、植、動乃至人類的，都有他各自的「同類模型」，這當然不是或然的巧合，而有必然的。宇宙進化既是必然的向上發展，則人類進化亦將依必然的向上發展而步入幸福之門。所以人類前途是樂觀的。只要我們從力行中去發得知識，再根據知識繼續工作奮鬥，使人類生活日進無疆，人類文化隨事增進，則大同之世，當在不遠。

國父創「知行易」學說，把知行在人類生活中作爲本探源的研究，并說明知行兩者先後錯綜的關係，爲人類進化的關鍵，爲人類進化的因果。他把人類進化也分爲三個時期，草昧時期不知而行，文明時期行而後知，科學時期則知而後行，這是知行在人類進化的生活歷史中之發展的過程；這種知行的發展，是實踐在先，認識在後，亦即先行在先，知在後。人類最初從混沌蒙昧中求得知識，其始則不知而行之，其繼則行而後知之，終則因已知而更進於行，所謂以行而求知

，因知以進行，就是由實踐到認識，又由認識到實踐，換言之，就是再行到知，再由知到行，如果用一個公式來表明，便是：

實踐(行)——認識(知)——實踐(行)

這種知行行的繼續發展，一級較高一級，實為人類歷史進化的途徑。

(六) 目的論

人類的行為，若無目的，便是「冥行」或「妄動」，決不能成功。一件若何有益的事業，因為目的有堅持作用，能使人行到底；有指導作用，能教人知道怎樣去行；有選擇作用，能令人採取善行。人類的行為與生物的行爲間之區別，即在於人類的行為富有目的性，使一切行為皆與其目的有密切的關係。此種有目的之行為，速率與持久力皆增大。近代教育上注重活動原理，提倡設計教學法，就是這個道理。古人說：「有志竟成」，夫志者心之所之也。「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幾句話可以說明「有志竟成」的理山。知止就認清目的，有定就是決定目的，目的既經認清，就是立定了志向，志向既立則靜，安、博、得各步驟皆相繼而來，結果是達到目的，完成志願。力行哲學勉人力行，決不是要我們去輕舉妄動，而是要我們認定目的，然後努力實行。但力行的目的是什麼？總裁很簡單地回答說：「仁」字。我們所行的就是行「仁」，所以智仁勇三者雖說稱三捷徑，而智在知「仁」，勇在行「仁」，仁是智勇的目的，智勇只是仁的手段。然則「仁」又是什麼呢？仁就是「生」的意義發動處，換言之，就是「生」的源泉。如桃仁杏仁，從那個「仁」裏面就可以生長出桃和杏來，沒有這個「仁」，桃和杏就無從得生。簡直可以說「仁」就是「生」。周茂叔認為：「生仁世」，王陽明以為：「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所以我們行仁就是求生。但是所謂求生，並不是單獨求個人的生，同時還要求人類全體和宇宙萬物的生。所以仁又含有公的意義，故「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行大道即是行仁，韓退之認為「博愛之謂仁」，博愛就是公愛而非私愛。仁

幸有欲求達仁之目的，雖犧牲個人生命，亦在所不惜，所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就是這個意思。所以總裁說：「仁是本乎大公，出乎至誠。」國父創建三民主義，是以民生哲學為基礎，以人類全體幸福為依歸，而終極的理想是世界大同。因此，國父認為「三民主義即仁之所由表現」，總裁更闡發其旨，以為仁的內容，就是博愛，在倫理方面推廣出來，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在理論方面推廣出來，就是天下為公的三民主義。所以我們行的目的，也就是實行三民主義，以求得全體民生的幸福。

(七) 動力論

在求得全體民生幸福的奮鬥行程中，必有許多艱苦困難，但我們要怎樣才能打贏艱難，使行的精神恆久不輟呢？這就必須有一個誠心誠意至誠無息的「誠」字為其原動力。有了忠誠，公誠，說實的努力，縱然有失敗和挫折，最後一定達到目的。中庸說：「誠者，成也」，只要誠說，必能成功。故曰：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不過我們還要知道，誠就是行「仁」。吾人要誠心行仁，才能有勇氣和決心。總裁認為我們行的出發點，只要是發乎天性，出乎至誠，是利他而不是利己，是救人而不是害人，那麼所謂「誠者物之終始」，開始的時候，就已伏有最後成功的因素。循此而行，前進不輟，就不見有難行之事，亦決沒有不成功的道理。反之，一個人如果不誠，他就只有私而不知有公，他的聰明才智，便會用來作奸作惡，他的「仁」便會變為假仁假義，他的「行」，也就不是真正的行，更不是我們所謂的力行。

總裁認為智仁勇三捷徑，是革命精神之所由發生，亦是革命事業之所由成就，而歸結其總的動力，則是中庸上所說的「所以行之者一」的誠。本來仁之「仁」字，有幾種含義，所謂「誠則明矣」，就是說無不皆「誠」所謂「成已成物」，於是說誠通於仁，所謂「至誠無息」，就是說唯誠乃勇。至於整個「誠」字的意義，則是一「操持固執，貫徹始終」的意思。因為唯有誠乃能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唯有誠乃為物之始終，乃能一往無前，貫徹到底；唯有誠乃能創造，能

奮鬥，能犧牲。也唯有說乃能行乎其所不得不行，盡乎其所不得不盡。有了說，便沒有什麼外力所能阻礙，所能使其停止。一切革命先烈的決心成仁，純然是出乎一片至誠，所以說是一切行動的原動力。如果不誠，便不能行，更不能力行。因為唯有誠說，才有信心有勇氣與決心。「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與強即是誠的兩面。明是光明照徹，絕無滯礙，強是自強不息，貫徹到底。所以，總我認爲該是行的原動力。

(八) 方法論

方法是求達目的有效的一種行動。不依方法而行，則無論怎樣努力，也必不能見「行」的功效。俗語說：「不依規矩，不成方圓」，可見方法的重要。而「行」的方法又必須是科學的，因為現在是科學的時代，一切要合乎科學，而不能違反科學。欲求得經濟有效的科學方法，第一在於決定目的（立志）。有目的的行爲才能熱烈持久，個人與羣體的事業莫不皆然。有志者之所以能成，即因其力集中熱烈追求之故。現在我們如果能够以三民主義灌輸於每個同胞，使成爲人格中的堅強情操，全國國民都朝著這個目標，約然不惑的專心一意的向前做去，不達目的，決不中止，則三民主義建設的實現，必可加速完成。

第二在於擬定計劃。計劃是做事的起點，我們做一件事，先要找到從何處著手，才最自然最便捷最容易收到效果。所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因難於易，爲大於細」，這邇與卑，易與細，就是「行」的起點。我們無論做甚麼事，都要注意這個起點，所謂慎始才能行終，切不可只知好高騖遠，而不從基層工作做起。不然，就決不能有所成就。

第三要按照順序而行，在未行之始，就確定計劃，規定順序，而且要系統分明整理整齊。總我認爲辦事成功的一個要訣，就是要因人因事因時因地而制宜，首先要把握一件事物周圍的環境，和事物本身的内容，認清了對象，又要根據客觀和主觀的種種條件，來決定着手進行的步驟和逐步實施的整個計劃。然後可以按照實行。同時還

要隨時進行，隨時考查，改正錯誤，補救缺點。國父所謂行以求知，就是這個意思。這行以求知，實爲創造發明不可少的方法，其原理已詳見認識論中。我們做事能依照這種科學的方法去行，才不致先後失次，本末倒置，緩其所急，急其所緩，才能保障成功。

第四必須有經常的耐久的精神。因爲行是循着軌道朝着目的，繼續不斷，川流不息地無時無刻不在它行進之中的。我們要事業成功，就要循着自然的道理和人生的本務，自強不息，踴躍做去，生活一天。力行一天。孔子說：「君子遠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可見行是不能間斷和中輟的。這樣的行才是發於至誠的行。才是我們所說的力行。總括的說，行的方法論，是必須有目的，有計劃，有順序，而且要是經常的恆久的。

(九) 結語

歸納以上所論，我們可以知道力行哲學是以科學的真知特識爲基礎，以救國救世的民生幸福爲目的。它是出乎至誠，歸於至公。這是一種創造樂觀的哲學，一種人道的革命的哲學，是一種唯生的大眾的哲學，也是一種民族的科學的哲學，一種理想而又實際的哲學。這一哲學的理論體系，博大精深，在這短短的篇幅裏，僅是作一縹緲索頤的說明。惟作者學識淺陋，自不免掛一漏萬之說。此後當以長久的時間，繼續作深刻的研究，使這一學說的理論體系，日臻健全。但說到這裏，我還要重複前面所說的一句話：「力行哲學不是坐在研究室裏高談闊論，而是要把它作爲行動的指導」。所以我們研究力行哲學，並不是如博士講經，支離破碎的斤斤於語言文字間，而是要能見之於事物與行動。道雖遠，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猶子所謂「知之不若行之」，就是說認識事物的真理，不如親自動手去做的爲可貴。我們研究力行哲學，就要坐而實立即起而行，辦事如疾風之掃落，如雷出地而無不動；做人先要修身行己，而後爲人爲政，使言論與行動相符合，理論與實踐打成一片。這才是力行哲學的精華，也才是我們研究力行哲學的本旨。

讀「政治的道理」和「行的道理」

符 浩

我讀了「政治的道理」和「行的道理」兩篇文章，覺得不但是總裁的偉大，寄託在這高遠博厚的哲學基礎上，而且是全黨同志應奉爲「行政用人」的一種崇高的準則。我們爲要顯示高遠的政治目的，是要有良知，爲要達爲高遠的政治目的，是爲致良知。我們把這兩篇文章聯合貫通起來，便得到一個「說」。這一個「說」字的妙用，是從審思，明辯，篤信，力行中體念出來的。

我們從「政治的道理」中去探求政治的真義，就是一種純高的政治行動，是以人類的本性爲本源的。總裁說：「政治如果不違反人類的本性，就像植物得到養料一樣，必能推行無阻，而且成長得格外迅速」。這就人類的本性從什麼地方看得出來呢？所謂本性，是與生俱來的。從團體說：一個人從出生到老死，飢思食，渴思飲，沒有片刻停止他求生的慾求，由自身而愛父母，愛家庭，從社會說，人與人之間，推愛及於自身關係的同胞——陸姻任，而推到仁民愛物，以至於愛人類。那麼一種純高的政治目的，無非在滿足人類生存的要求。因爲人類所同具的本性，就是求生。這個政治原理，在任何不同的時代背景，任何文野不同的民族，無古今，無中外，是不能絲毫有損其存在的偉大價值的。

中國社會是一個理性發展的社會，所謂理性，是從人類所同具的求生這一慾念而起的。因爲自己要求生存，也就不能妨害他人的生存，而能扶助他人生存的發展，所以政治上重在扶危濟困，養老育幼，這就是文王「發政施仁」的道理。但是人類不能長此循着理性的發展，而爲私慾所蔽蔽了。王陽明先生所謂良知，是使人能去人慾，存

理。所謂天理，就是人類循着理性的正常發展，不違反人人心目中所同具的本性。如果違反了人類的本性，就形成什麼惡果呢？聖經上說：「人化物者也，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智者詐愚，勇者苦怯，疾俗不發，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這種悖天逆理的大亂現象，自然由於違反人類的本性而起的。

進一步講，怎麼去達成這種純高的政治理想的目的呢？就在於得人，因爲「人」是一切事業的原動力。總裁說：「至於政治的力量，則全然在於行的「行」字。若說政治的極致，則不外使人人各盡其力，各得其所，各遂其生，而政治的首要，還在於得人。在使有道德，有能力的人，和各種事業配合起來。而得人的先決條件，就是要我們担負各級政治，尤其基層幹部的，先把自己修養成完備的人格，我們自身有了完備的踐履篤實的人格，纔能吸引已有能力的人才。訓練出各級勝任的人才，能實踐篤實的去行，……我希望我們同志切實記住政治的起點和終點，都是以人爲本。雖却人生的政治，決不是爲全體人類謀幸福的政治」。由此我們體會政治的真義，是使人盡其才，使人人有貢獻其能力於國家社會的機會；更要有完備人格修養的人來擔負起推動國家政治的任務。才能使人各盡其才，各得其所，各遂其生，去達成純高的政治目的。

我們更要去展覽當前的政治現象，政治的效率增進了嗎？民衆的知識能力提高了嗎？政治的基礎建築得很穩固了嗎？時樞究竟一句話，現在於一個「人」的問題。現在不是說沒有人，各方各面要算人才充溢了，但是很少有人去研究做人的道理，無形把人之所以爲人的理性淹滅下去了，沒有盡其爲人的真實義務。王陽明先生說：「某件說知是行之主意，行實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已可理會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爲二者，緣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慮省察，是之爲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而後行無移。又有十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是之爲揣揣影影，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覺」。這樣知得真時，便要去行，說到實踐的功由，便是總裁所稱的「行的道理」。我們明白了「政治的道理」，

有理性作祟，不是出於自發和自覺，因而動盪一番以後便停止下來，或是在於消沉和寂滅，好像一口枯井，要得人去敲鑽會發動，敲鑽了，不去敲了，便靜寂了，這是不是我們革命哲學所要求的力行。因為這樣的動，是沒有經久效果的，是不能推動人生的。『行』與『動』之不可混淆。

既然我們瞭解了『行』與『動』是有着區別。那麼我們就要如何去動伏住『動』而從『行』的進程中去落實自己的人格，完成『抗戰建國』的任務呢？一個人本來就具有選擇其行為善惡的本能的。當一夥盜賊搶行無忌的時候，起初未嘗不受到良心上的譴責，但至念一生，爲了達成其攫取的期望，以搶掠財物之外，更不惜爲害人的生命，所謂『一不做二不休』，又有誰不知道這是一種不當於義理的行爲，只是爲慾慾所閉塞了。因此『動』是以人欲的衝動或邪說的煽動爲起點的。我們看清楚了那種動是不正常的，然而往往不能制伏住『動』，這便缺乏一種省察克制的功夫，不能以靜制動。假使我們把自己的一言一行，時時去檢查，時時去克制，不在『損人利己』上作打算，更把眼光放遠大一點，在當時見到是有利的，過此以往，未必不蒙受損害，這消了人情，看透了邪理，我們怎會爲一時的利益而『動』呢？假使我們由於一時的衝動而『有動』，『有動』，也必須作一番省察的功夫，如果出發點是利己，倒反變成了害己，其出發點是爲教人利他，倒反變成了害人，到這時我們還不失制伏住這種『動』而走向正確『行』的路向上嗎？

許多識見短淺的人，僅看到一時的利害，把個人利害置諸一切事業之上，我們要說『工作第一』，毋謂謂爲『利害第一』，都是爲着『損人利己』的打算。而防止一切事業的發展，有難去置諸。我深遠的旨意去有所作爲的呢！從後方看到前方，從前方看到後方，所以，組織在本年元旦的廣播演講中說：『老實說，我們實在說不上現代的民族精神，亦說不上作一個參加現代戰爭的戰鬥員，已往的並且不必去追溯了。從今以後，如果我們仍舊因循過去，社會依舊不成爲戰時的社會，政治依舊不成爲戰時的政治，經濟依舊不成爲戰時的經濟，教育文化亦不成爲戰時的戰時文化，一切國民生活，不成爲真正戰時的國民生活，那我們不但沒有戰勝的希望，而且也無以立國在將來的世界了。』這些話就是一個力行的問題。如果我們把握住『

行』的真實意義，認清目標，端正路向，確定步驟，有決心，有毅力，又有什麼困難的環境不能戰勝，什麼艱鉅的事業不能完成呢？因此我們要達到『行』就要把一個人的心意落在實處，究竟要如何去『行』？是要我們從實踐中體驗出來的。

什麼是實踐？這是一種實踐的功夫，就是如何踐履實行的去『行』。因此得到實踐的功夫：其一是認定在我限分以內見到某一種行爲是正常的，而且是認爲必要的，就不可難以絲毫利害的因素在內而面。如果把個人的利害放在前面，既畏難，又懼損，往往弄到無適而可，不能把自己的主意貫徹下去，有時不得不折轉路向，一反其平日之所爲，如是許多廉隅之士變爲貪污了，許多正直敢言之士，也變成模稜兩可與世浮沉了。這就是失去了一貫『行』的本義。其二是把此心放在實處，不可有絲毫『急功近名』的膚淺之見，而設在內而。如果果是爲了功，就有許多致力的地方，不能耐性下來，或爲功不充，工作就被放棄了；在對人的方面，期望過高，不能與人無怨尤，就不得不與人鬧意見，生磨擦或竟因此而灰心下來。如果是爲了好名，遇事不免有一顧自是之見，而處處從表彰自己的地方去設想，又忌他人之名，乃至置不絕口，以盡其排擠詆毀的能事。這種心關的『行』，是根本與『行』的道理相違背的。因此我們一種踐履實行的『行』，是不避艱難，不顧利害，不計近功，不慕虛榮的一種至誠無偽的踏實的行爲。

我們要求怎麼的『行』呢？總我會指出『行』的真諦，他說：『這一個『行』的精神，就是革命精神。只要是他分內之事，只要是主義信仰和職責所在，就是到了頭渾流渾，乃至赴湯蹈火的時候，亦能泰然自如，無所阻難，更無所謂畏，這樣的去行，還有什麼不容易呢？因之，我們『行』的出發點，祇要是發乎天性，出乎至誠，是利他而不是利己，是救人而不是害人，那末所謂『誠者物之終始』，開始的時候，就已伏有最後成功的因素，循此而行，前進不輟，就不見有什麼難行之事，亦沒有不成功的道理。所以我們行事，只要以至誠去力行，就必能信實行，惟有信實行，纔能算是行。這樣的行，總能事事精益求精，實事求是，且必始終如一，貫徹到底，就決不會有粉飾張皇，苟且敷衍的習氣。這樣的力行，總能不畏難，惟有不畏難的去行，就覺得『行易』，所以只有力行，才是行易。這樣

